



# 索绪尔语言学与语言相对论\*

于东兴<sup>1</sup> 张日培<sup>2</sup>

(1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 200062;1 国家语委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  
上海 200032;2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032)

**提 要** 本文探讨了语言相对论和索绪尔语言学及认知语言学的关系,并简要梳理了语言相对论的发展,并简要介绍了语言相对论的三种诠释模式:词汇模式、词源焦点模式和语法模式。本文指出,索绪尔一方面反对盛行于19世纪、基于洪堡特观点的语言相对论,另一方面在自己的语言学里又暗含语言相对论的观点。索绪尔关于意义和概念的观点为认知语言学所继承和发展,进而成为新语言相对论的发展基础。新语言相对论在诠释方法上回到传统模式,既有积极的进步,也有消极的倒退。

**关键词** 索绪尔语言学 洪堡特 语言相对论 诠释模式 认知语言学 概念 意义

## 一、语言相对论:起源与诠释方式

语言相对论有多种不同表现形式,Black(1969:31)指出,由于对语言、认知的诠释方式不同,语言相对论的变体至少可分 108 种。Lakoff(1987:334)甚至认为“语言相对论有几百种表现形式”。但语言相对论的核心观点始终是不同语言间的差异与不同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差异有关。这里的差异主要指不同语言间的语义差异。<sup>①</sup>而满足语言相对论的两个基本假设是:第一,不同语言间存在语义差异;第二,这些差异可以通过认知来解释。本文认为,语言相对论可以分成两个发展阶段:始于 13 世纪盛行于 19 世纪的传统语言相对论和 20 世纪以来的新语言相对论。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语言学思想是两个阶段的分野。

西方早期哲学家通常假定人都有着同样的概念集,词汇是概念表征,不同语言间不存在语义差异。普遍概念集的假设盛行于 17、18 世纪,对于概念直接反映出“事物”这种直接投射关系所代表的“幼稚现实主义”<sup>②</sup>,康德持否定态度,但认为人类诠释现实的框架是普遍统一的(De Pater & Swiggers 2000:163-165)。对于那些现实存在的概念差异,早在 13 世纪,培根<sup>③</sup>就提出,所有语言的语法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差异只是偶然。到启蒙运动时期,洛克<sup>④</sup>等经验主义哲学家仍坚持认为,不同语言间的语法差异只是基于同一主题的表面变化,希腊语和拉丁语就是普遍通用语法<sup>⑤</sup>的代表,体现了人类思想的普遍结构(De Pater & Swiggers 2000:95)。

然而,翻译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与普遍通用语法相悖,如一个 10 世纪的作者在将希腊语译成保加利亚语时,除词汇差异外在语法上也碰到诸如加冠词与不加冠词和相应名词性实词存

\* 本文得到国家语委重大项目“母语的地位作用与和谐语言政策的构建(ZDA125-10)”资助。

在性别差异等问题(Lepschy 1998:124)。对理解一些差异较大的小语种语法,其时主流语言学家的先验通用论调并无用处(Nowak 1994)。人们开始认识到所谓新奇语言带来的语义、词汇和语法差异,绝非偶然或个例,而是表明人类对现实有多种不同的概念化方式和表达方式。最终,语言相对论在德国得以发展,代表人物就是洪堡特,<sup>⑥</sup>当时具有民族主义和空想色彩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是诠释语言和文化差异的主要方法。“语言外表及语音的不同,哲学公理以及一般的语法,将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并被转化成人民精神面貌的不同……词汇总体代表了一个民族所处的环境,而语法构成并代表了该民族的思想有机体……”(Knobloch 1988:186)

传统语言相对论视角下的语言间差异大致有三种诠释方式:词汇、语法和词源焦点。如果语言A的某个词在语言B中没有对应的词,并不能简单归为认知差异,如“一个没有通神学的社会当然没有通神学的名字”,这种情况显然不关语言学家的事(Sapir 1921:219)。再如亲戚的表达方式,“表哥、表姐”之类的称谓英文中统称为“cousin”,缺少具体对应;“伯伯、叔叔”,英文中都是“uncle”。因此,只有A语言中的某个概念词,在B语言中没有对应词,但有类似的概念可以辅助理解A语言中的概念词,这种情况才可归为以词汇诠释的语言相对论。

词源焦点关注的语言事实也是词汇,但核心是语言要素原始含义的现代意义体现。即在不同语言间存在对应关系的两个词,其各自的原始含义可能不同或存在部分差异,这常常导致词从中心义转向边缘义,使两个语义相应的词实际呈现不同的语义焦点。如使用交通工具火车,中文“坐火车”、英文“by train”、法语“par le train”,“坐”“by”和“par”在词中起背景作用,但如果考察这三个词的基本义,就可以解读出相应的认知差异:英语使用者将火车视为工具,法语使用者将火车视为能源,而中文使用者则强调主体与所使用工具的关系。

不同语言语法差异可能涉及的认知差异,远不如词汇差异明显。因为语法涉及语言整体,而非某个具体的词汇特征。语法差异的认知诠释主要基于针对语法元素的假设性意义,以及这些假设在语言实际应用中的功用。前文提到的普遍通用语法假设,是以拉丁语法为蓝本,即各种语言的语法都是根据屈折变化来区分的,屈折变化是反映语法关系的唯一方式。洪堡特据此将语言分为屈折语、粘着语、孤立语和复综语。并提出,这些语言类型不是对等的,不同类型语言间的语法差异是语义式的。汉语作为孤立语的一种,由于缺乏结尾的屈折变化,被视作是“杂乱无形”的语言,即一切依靠屈折尾部表达的结构语义信息在孤立语中都无法表达。按照这一逻辑,自然就得出用孤立语表达的思想也是“杂乱无形”的。用洪堡特追随者斯坦因塔爾的话说:“如果一个民族不清晰或者无规则地介绍自己的价值观,那就意味着在其自我认知和语言里几无规则。”(Steinthal 1860:162)传统语言相对论的这种偏见,尤其是对汉语的狭隘理解,有助于我们客观审视西方语言学对汉语研究的影响。

## 二、索绪尔语言相对论批判

Gumperz & Levinson(1996:4)认为,索绪尔在《教程》中明确提出了新语言相对论的思路,而泰勒在“认知语法”中也指出,索绪尔的语言观是一种“极端形式的语言相对论”(Taylor 2002:55)。索绪尔将不同的自然语言和某种语言的不同历史阶段都视为一个整体,任何变化都会对整体带来影响。如同一个星球在纬度和重量上的变化会打破整个太阳系的平衡,进而变化成一个新体系(Saussure 1972:121)。

### 1. 对传统语言相对论的否定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索绪尔批判传统语言相对论的表述:

语言可以为解决人类学、种族学和史前史的问题带来启发吗?通常认为可以。但在我们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觉。(Saussure 1972: 304)

之后,以闪族语为例,他对前述的“幻觉”做了具体的描述:

在谈话时,闪族语用简单的并置来表达两个名词间的从属关系……被决定的名词在前,采用一种被称作“建构状态”的特殊形式。如……我们能说这种句式反映出闪族人的精神状态吗?如果这么做,难免失之轻率,因为古法语中也有类似的构式……(Saussure 1972:311)

索绪尔进而总结道:“用人们表达想法所采用的方式来诠释和确定不同语言的语法类型总是很有吸引力的做法。但分析表明,在语言学领域之外,得不出任何明确合理的结论”(Saussure 1972:312)。

而在全书的结尾,他重申了“语言自治”的观点:“上述偏离语言学边界的讨论,得到一个反例,但有趣的是,这恰好支持了本教程的核心论点:语言学唯一真实的研究目标是语言,针对语言自身,在语言内思考”(Saussure 1972:317)。

索绪尔所处的时代正是语言相对论盛行的时期,他指出,“认为一种语言反映出一个民族心理的观点非常常见。但对此应严肃反对。语言学的特征并不必由心理因素来决定”(Saussure 1972:311)。这种语言自治通常是被视作反语言相对论的,即在语音和思维之间构建出一个独立的语言符号层。但也有学者认为,索绪尔的这一论点并不暗含反语言相对论的立场,相反,可能深受洪堡特影响(Willems 2005:265)。另外,斯坦因塔尔作为洪堡特的追随者之一,也认为语言是一个独立的系统(Bakker 1988:188)。

索绪尔(Saussure)坚决否定词源焦点模式的诠释可行性,“共时和历时之间的观点对立是绝对的,不可妥协的”。而对核心语义与边缘语义诠释所代表的命名法观点,索绪尔也持强烈否定态度。他认为,语言符号并不是将语音对应到完全空置的概念中去。事实上,语言符号是在原始无形的概念体中创造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将不同的概念做边界区分。这些语言符号的值或意义是完全差异化的,语义对举明确了不同符号间的边界,而非靠内部的结构化内容。

如果说这些值和特定的概念相对应,这必须理解为那些讨论中的概念都是完全差异化的。也就是说,那些概念不是根据它们的内容被主动定义的,而是在同一体系内相对其他条目的被动赋值。每个概念最准确的特征就是无论如何都和其他概念不一样(Saussure 1972:162)。

此处对值或者意义的看法暗含整体语言观,即不同语言虽各有边界但所有语言对应同样的概念体系。如果语言A的某个词在语言B中没有对应,只表明这个词的语义在语言B中以不同的方式被分散了,由多个不同的语言符号来实现并和前者对应。词汇差异基于不同的语义场划分方式,而非因命名法而产生。

“虽然人们常这么想,但语言并不是由被表达的概念所组织和创造出的机制”(Saussure 1972:122)。或者说,不同语言间总存在着同样的意义,词汇间也总有确定的对应关系。因此,任何孤立考量单一要素而忽略其与系统内其他要素关系的做法都是徒劳的。“一种语言是一种系统,系统内所有的部分都可以而且必须被视作共时独立的”(Saussure 1972:124)。

## 2. 新语言相对论思想

索绪尔否定并改写了盛行于19世纪的语言相对论,新语言相对论从索绪尔开始。他假定

存在一个独立于语言之外的概念集,而这个概念集总需要被词汇化和语法化,不同语言的词汇化和语法化构成基于同样概念集的马赛克拼图,形成基于同样意义的相对差异。概念作为实质的内容是常量,一种语言就如同一套模具,模具本身是空的,有界无实,只是被动赋值;各种语言又如地图,在同样的疆界内勾画不同的界线,对整个疆域没有影响。因此,索绪尔式的语言相对论又被称为语言符号相对论或者语言形式相对论。

在此要严格区分几个概念:符号(signes)、值(valeur)和意义(signification)。符号是关于值的空集,值和意义不同,值是意义的一部分,只能经由被动和对立的方式实现。但值之外的意义部分是什么,索绪尔则语焉不详,如有学者指出:

索绪尔关于值的讨论,最无法让人满意的,就是他一面坚持值与意义不同,另一方面又从未点明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指出值是意义的一部分,但从未告诉我们值之外的那部分意义是什么。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使在他自己使用的例子里,我们知道 mouton(羊肉)和 sheep 不同的唯一途径是前者涵盖的意义更多。(Joseph 2004:67)

索绪尔将语言系统比作货币系统。他以五法郎为例,五法郎可以和不同的事物发生联系,即五法郎可以买到什么?意义和概念的关系即是如此。而五法郎和一法郎的关系,就如同值和符号的关系。也就是说,在“mouton”和“sheep”之间永远不存在一致值,但会存在一致的意义(Saussure 1972:160-161)。索绪尔在此想要强调,除了表示语言相关的概念,意义有独立的集表示概念集。仍以上文的 sheep 为例,如将其看成一个物种,那 sheep 的意义就和不同语言里的词汇边界大小无关,不会自动指向某个具体使用的词,而是依据实用情境来确定。但即使如此,值和意义间的主导关系仍是模糊的,如果值占主导,那不同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差异是直观的;如果意义占主导,那认知差异则是概念背景化的,是所有相同意义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同惯例表达方式。从《教程》中我们无法找到更明确的表述和佐证。假设意义为主导,那么意义就直接关乎到语言使用者在特定场合想要表达的东西,选择得体的惯例表达由此成了言语方式的核心所在,而言语方式的其他功能则退居其次(Dinneen 1967:219)。

独立的意义、常量且无形式的概念空间、经由语言符号呈现出的马赛克式拼图结构,索绪尔的这些观点对语言学其后的发展影响深远。

首先,将概念集视为先验常量和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能力和普遍语法存在联系,或者说互为统一:先验概念集只能存在于人的思维和意识中,索绪尔只强调了语言的符号性和系统自洽性,而空置了语言从何而来这个基本问题;但既然概念集是先验常量,而语言又是在常量不变前提下的相对形式结构变化,那么人类自身具有某种将概念转化为语言表达的潜力和通用规则,就成了合理推断中的必要一环。而马赛克式的拼图结构,在意义独立且总界不变的前提下,自然就可以有任意多种组合形式,这也就是乔姆斯基所谓的“语言表现”,而索绪尔从赋值到意义留下的缺口,则由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算法”来补足。

其次,在语言实践中,意义总需要借助实质语义特征来描述,单靠“语义对立”和被动赋值是无法让语言符号表征意义的,词汇必然具有某些正面实质的特征。这意味着词汇特征绝非仅是相互区别,而必然与人类概念集存在某种本质联系。如语言相对论者经常使用的例子——色彩词条,实验证明,不同语言的心理焦点色存在一致对应关系,虽然不同语言的色系分界截然不同(Lyons 1977:247)。这虽然否定了索绪尔的词汇观,但却证实了索绪尔意义独立的观点,并直接启发了语义场理论。

特立尔认为,一个语义场由多个词语构成,表示某种知识或技能的形式,特定语义场中词

语的拼接方式是马赛克式的,每个词都代表了这种知识的一部分;而且,这种语义场拼图是存在历时变化的(Trier 1973:40-65)。基于这种历时变化,特立尔描述了一系列和社会文化因素相关的认知词性变化。这是以索绪尔为基础但又不局限于索绪尔,更为务实的语言相对论。特立尔假定意义具有比值更为丰富的内涵,他重构了作为常量的概念域,将所有的意义都划分成两个阶段,意义在第一个阶段具有道德、宗教及所处时代的相关社会阶层的内涵;到第二个阶段,那些内涵已经消失,只能通过智力、技能和相关词汇来理解这些意义。但意义究竟是什么?意义和先验式的人类概念集(域)是什么关系?这些根本性问题仍悬而未决。

### 三、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相对论

认知语言学家大都不以语言相对论为纲,但多名学者在其实际研究中都延续并发展了十九世纪的传统语言相对论。

#### 1. 词汇模式与词源焦点模式的发展

认知语言学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词义的多义性,词的意义由一系列相关子意义共同构成;二是原型理论。所有的词汇差别都相互关联,意义和概念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甚至一致的关系(Dirven & Verspoor 1999:17)。认知语言学家认为,结构语义理论,尤其是特立尔的语义场理论,有非常大的局限性,“结构语义理论坚持认为,要充分描述一个词条,就必须描述这个词条在词汇场中的位置。另一方面,认知语言学秉承原型论的研究传统,重视对词条范畴内部结构的研究……认知语言学坚持认为,不能仅基于与其他词的区别来描述一个词,还必须研究每个词所能包含的合理内容”(Geeraerts, Grondelaers & Bakema 1994:193,11,87)。如“推导”,在中英文里都有一系列的词构成一个意群,汉语里通常会说“我们得出这个结论”“他接下来的推导很困难”。英文则表示为“*We came to that conclusion*”,“*The next step in his reasoning was difficult*”,按兰考夫的观察分析,在多种语言中,“推导(reasoning)”的语义都来自“traveling(旅行)”,即将推导过程视为一次旅程(Lakoff & Johnson 1980)。在他们看来,语义学的核心是隐喻义,在语言中总是存在从源域(source domain)到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投射或转化。但在汉语中显然需要重新诠释,“推导”和“得出”都没有“旅行”义,“推”和“得”的原义都是人的基本动作,按认知隐喻的分析方式,汉语“推导”意群从源域投射到目标域的,是行为主体与问题之间的行为关系。这更类似于兰考夫对米斯特克语(Mixtec)的讨论,一种将空间关系用身体部位词来表示的语言。兰考夫强调:“这绝非仅关乎我们使用哪些词来表达我们的概念,更重要的是系统理解空间位置通过身体部位与概念发生的关系”(Lakoff 1987:313)。

有学者(Honeck 1989:284)指出“兰考夫的这种做法似乎是自相矛盾。如果身体经验的确是人类的共性,是隐喻的基础,那为什么人类的概念体系又彼此迥异呢?”以兰盖克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家否定了兰考夫将“源义”直接对应“目标义”的做法,他们更倾向于将意义视为抽象概念的共时具体体现。另一方面,既然字面义通常被视作原型,而隐喻义被视作引申,因此历时性也必然存在(Taylor 2002:505)。兰考夫的隐喻论只关注身体经验,忽略历史文化因素对隐喻产生的作用,如很多情绪隐喻都和古代的幽默理论有关(Geeraerts & Grondelaers 1995)。

#### 2. 语法模式的发展

传统语言相对论下的语法诠释在认知语言学背景下没有实质发展,仍是依据某些语法元素的存在或缺失来推断认知差异。兰考夫举过一例,迪尔巴尔语(Dyirbal)中,所有的名词都有四个强制前缀,与四个前缀相对应的语义范畴被视为迪尔巴尔人基础认知结构的语法化体现。兰考夫的这种语法范畴观和沃尔夫一致,在沃尔夫看来,语法是背景系统,通过强制和隐含的范畴来组织语言,兰考夫将其表述为“基础概念倾向于语法化,即成为这种语言的一部分。如此,就会被无意识、自发且经常性地使用。一般来说,语法化概念比一般的词汇概念更核心”(Lakoff 1987:308)。

兰考夫 1987 年的著作中有一章专门讨论“沃尔夫和相对论”,“我是个相对论者吗?我持有的观点大约是几百种相对论形式中的一种”(Lakoff 1987:334)。波兰语义学派的安娜维茨比卡的观点则更具代表性,她关于欧洲语言与认知差异的研究,大多可表述为“Z 语言的使用者概念化 X 为 Y”,她曾将英文 happy 与德语 glücklich 和法语 heureux 做对比,来解读“快乐”在几种语言中的表现差异。她认为,“快乐”在英文中的表述最弱,这可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有不轻易表露情绪的传统(Dirven & Verspoor 1999:168)。她还提到俄国人经常使用非主动人称的构式(Goddard 2003:413),如一个母亲要对孩子表达“我不会给你买冰激凌”的意思,实际会表达成“这儿没有冰激凌给你”;“我觉得 / 我想去……”这类主观表达,俄国人通常说成“那认为 / 那想去……是我的想法”。维茨比卡将这种情况称为“俄式宿命观(Russian fatalism)”,即事件被概念化为命定的方式。

#### 四、语言相对论:质疑与发展

语言可能独立于认知存在,即使都说同样的母语或使用同样的语言,概念体系和思考方式也因人而异,更何况语言学描述通常是针对使用某种语言的整个社群。而意义和概念可能并非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一个概念即使没有词可以表达,也仍可以存在或被轻松理解(相关实例见 Frank *et al.* 2008);相反,有词不代表必须有概念,如哲学家帕特南说他而言,“橡树 oak”和“山毛榉 beech”都是同样的概念(Putnam 1979),以此证明意义和概念之间存在差异。

波兰语言学家维茨比卡的研究实际上仍是基于概念与意义匹配一致的假设,但缺乏实证,更像是主观臆测。如 privacy(隐私)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核心概念的论断,就被批评是无端推测。而无语法形式无系统思维,语言间的翻译如无法完全转换,就视作另一种语言缺乏思想等推断,与其说是语言相对论,倒不如说是文化法西斯。语言相对论最需要避免从语源概念方式的错误直觉性归因,而对相应的语言使用者产生偏见。

语言相对论的三种诠释都是直觉判断的产物,所谓证据都是具有多种诠释可能性的语言现象。“如果我们概念化这个世界的现代方式是由普遍化隐喻是来支撑的,那仅仅识别出这些隐喻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单独证明隐喻不只有那些死的”(Geeraerts & Grondelaers 1995:171)。针对这种批评,已经有一些确定隐喻现实性的测试方法(具体见 Taylor 2002:500)。

语言相对论的三种诠释中,词汇模式的发展突破了索绪尔严格僵化的词汇语义规则,将所有不同用法的特征都纳入到意义中,从而可以将所有可能性都纳入讨论,让阐释效力最大。绑定意义和概念是新语言相对论的可行性基础,这是一种假设性对应关系,如果没有充分的调查和证据对比,得出的结论就会失之轻率。如兰考夫最著名的隐喻理论,实质是词源焦点模式的翻版,类似于 19 世纪将起源和本质混为一谈的历史主义思维模式,被称为思维逻辑倒退也不为过。索绪尔严格区分历时共时的伟大之处,恰在于对这种思维模式的否定。新语言相对

论的词源焦点模式基于共时的角度,坚持词汇、语法要素都存在多个意义,存在核心和边缘的区别,这是合理的。但多个意义在使用中可能存在共振,因而可能不需要所谓的焦点识别。

语法模式假定语法要素能起到独立的认知作用,这意味着索绪尔所说的值与意义存在完全的对应关系。但在话语实践中,前置的意义不会直接成为说话人想表达的东西,真正表达出来的东西总是在特定语境下组织出的语言结构。所以,当研究者对已经生成的话语做由果及因的语法认知差异泛化推断时,往往因特定语境这个参数而无法进行一般概括。

不可否认,被索绪尔结构框架否定的传统语言相对论,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得到重新发展;而认知语言学本身却是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论基础上发展起来。“语言本质上是符号。语言使用者可以得到……一个开放的语言符号集或语言表达集,每种符号都关联某种语义表征和语音表征。因此我全面接受经典索绪尔范式的主旨”(Langacker 1987:11)。“认知语法是……以索绪尔语言学为灵魂的”(Taylor 2002:19)。“在索绪尔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规划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联系”(Nerlich & Clarke 2007:579)。索绪尔提出的“概念”“意义”“值”和“形式”仍悬而未决,是任何语言学研究都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本文对语言相对论、索绪尔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三者关系的梳理,希望可以为母语研究与和谐语言政策的构建提供新思路。

## 注 释

- ①在不同语言间最常见的是语音差异,这些差异只和字词成分有关,无关认知差异,通常不会归为语言相对论。
- ②“naïve-realism”又译作“朴素实在论”,[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C3%AFve\\_realism](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C3%AFve_realism)。
- ③Roger Bac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ger\\_Bacon](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ger_Bacon)。
- ④John Lock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Locke](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Locke)。
- ⑤这里提到的“普通通用语法”区别于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UG)”,指人类语言存在统一的语法结构。
- ⑥Wilhelm von Humbold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helm\\_von\\_Humboldt](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helm_von_Humboldt)。

## 参考文献

- Bakker, Dick M. 1988 “Kritische notities bij Ferdinand de Saussure’s Cours”, Janssen, Theo A.J.M., Noordegraaf, Jan and Verhagen, Arie (eds), *De macht van het woord. Een selectie uit het taalkundig werk van D.M. Bakker*, Amsterdam, VU Uitgeverij, 181-218.
- Black, Max 1969 “Some troubles with Whorfianism”, Hook, Sidney (ed.), *Language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NYUP, 30-35.
- Dinneen, Francis P. 1967 *An introduction to general linguistics*, New York, Holt, Reinhart and Winston Inc.
- Dirven, René and Verspoor, M. (eds) 1999 *Cognitieve inleiding tot taal en taalwetenschap*, Leuven, Acco.
- Frank, Michael C., Everett, Daniel L., Fedorenko, Evelina, and Gibson, Edward (2008), “Number as a cognitive technology: Evidence from Pirahã language and cognition”, *Cognition* 8(3), 819-824.
- Geeraerts, Dirk, Grondelaers, Stefan & Bakema, Peter 1994 *The structure of lexical variation. Meaning, naming, and context*,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Geeraerts, Dirk and Grondelaers, Stefan 1995 “Looking back at anger.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metaphorical patterns”, Taylor, John R. & MacLaury, Robert E. (eds), *Language and the construal of the world*,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53-180.
- Goddard, Cliff 2003 “Whorf meets Wierzbicka: variation and universals in language and thinking”, *Language Sciences* 25, 393-423.
- Gumperz, John J. and Levinson, S. (eds) 1996 *Rethinking linguistic relativism*, Cambridge, Mass., CUP.
- Joseph, John E. 2004 “The linguistic sign”, Sanders, Carol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ussure*,

- Cambridge Mass., CUP, 59–75.
- Knobloch, Clemens 1988 *Geschichte der psychologischen Sprachauffassung in Deutschland von 1850 bis 1920*, Tübingen, Niemeyer.
-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CP.
- Lakoff, George and Johnson, Marc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CP.
- Langacker, Ronald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SUP.
- Lepschy G.(ed.) 1998 *History of linguistics, Renaissance and early modern 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
- 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Vol.1, Cambridge, CUP.
- Nerlich, Brigitte and Clarke, David C. 2007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 Geeraerts, Dirk & Cuyckens, Hubert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Oxford, OUP, 589–607.
- Nowak, Elke 1994 “From the unity of grammar to the diversity of languages. Language typology around 1800”,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4, 1–18.
- Pater, Wilhelmus A. de and Swiggers, Pierre 2000 *Taal en teken. Een historisch–systematische inleiding in de taal filosofie*, Leuven, UPL.
- Putnam, Hilary 1979 “The meaning of meaning”,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2, Cambridge Mass., CUP, 215–272.
- Sapir, E. 1921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72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16). *Édition critique préparée par Tullio de Mauro*, Paris, Éditions Payot.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oy Harris (1983).
- Steinthal, Heymann 1860 *Charakteristik der haupts chlichsten Typen des Sprachbaues*, Berlin, Dümmler.
- Taylor, John R. 2002 *Cognitive Grammar*, Oxford, OUP.
- Trier, Jost 1973 *Aufsätze und Vorträge zur Wortfeldtheorie*. (Lee, Anthony van der & Reichmann, Oskar (eds), The Hague, Mouton.
- Willems, Klaas 2005 “Die Grenzen der Ikonizität der Sprache: Saussures Konzeption des “fait linguistique” revisited”, *Ars Semeiotica* 28, 243–272.

## Saussurean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Relativism

Yu Dongxing, Zhang Ripei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aussurean linguistics, Linguistic Relativism (LR)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CL), making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LR interpretation patterns: lexical pattern, grammatical pattern and etymological & focal pattern. Then the paper shows that Saussurean linguistics plays a contradictory role in LR. On the one hand, Saussure has explicit anti-relativistic statements on LR, which was based on Humboldtian views and widespread in 19th century; on the other hand, his purely differential view of meaning actually allows for new LR. 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a continuation of Saussurean structuralism and develops LR in 20th century. Neo LR adopts earlier approaches,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Key words:** Saussurean Linguistics, Linguistic Relativism,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ception, meaning